

後冷戰時期台日特殊關係發展分析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儘管美國可說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迄今影響日本與台灣對外關係以及其彼此互動的最關鍵因素，但基於某些情境與因素，例如地緣位置、長期殖民經驗、社會菁英的密切互動，以及經濟發展連結等，致使日本長期以來便成為台灣除美國外關係最密切的一個國家。在此，我們不僅將從歷史角度，分析台日雙邊關係發展的前因後果，同時將透過「特殊關係」角度，並以美英關係作為比較對象，一方面藉此瞭解其是否真的存在「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希望由此觀察並預測其未來關係架構在後冷戰時期的可能發展。

關鍵字：後冷戰時期、日本、台灣、特殊關係

壹、當代外交中的特殊關係發展

若提到所謂「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則近半個世紀以來英國與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互動不啻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例證。傳統上，國家間的緊密聯繫通常表現在「同盟」(alliance)型態上，而相關研究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亦可謂汗牛充棟；例如 Pierre Hassner 便曾以三個標準來檢測國家間同盟的發展 (Zorgbibe, 1995: 32)：首先是「選擇範圍」，亦即盟國是否為自願加入而又能否自由退出；其次是同盟的「組織嚴密度」，尤其指對盟國的控制力；第三則是「權力差距度」，這牽涉到各盟國所負擔權力與義務是否合理；據此，他進一步將同盟型態區分為同盟、同盟集團與共同體等三者。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國家間同盟屬於何種型態，多數幾乎都以「有形且成文」的方式存在著。相對地，英美兩國間雖普遍被認為確實存在同盟性互動，卻從未簽署任何雙邊形式的同盟條約，這種「無盟約的同盟」(alliance without contract) 關係，不能不說是史上少見的特殊現象，這也是它被以「特殊關係」稱之的緣故。

有關這種「特殊關係」的起點，學者們曾做過不少討論，本文在此不擬多加贅述¹。不過，前英國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在 1946 年的演講仍值得一提：「…無論是想避免戰爭，或希望計劃當中的國際組織能夠順利產生，沒有我所稱呼為友人的英語民族的支持都不可能實現。我指的就是大英帝國、國協與美國間的特殊關係。…此種特殊關係包括的不僅是幾個體系相近社會日漸增加之友誼與理解，還包括對付潛在危險的緊密軍事關係、相

¹ 例如 H. C. Allen 便認為，英美兩國自十八世紀起就是「綁在一起的盟友」，並實踐了「自互不信賴轉變為盟友的堅持過程」，而美國 1823 年門羅主義與 1860 年代的南北戰爭所以能免於歐洲列強干預，英國的角色可說相當重要 (Allen, 1954)。至於 G. Nicholas 則認為，兩國海軍的歷史合作乃是「特殊關係」的起點，特別自第一次大戰開始，兩國在海軍方面便建立起聯合作戰架構 (Nicholas, 1975)；不過，更多學者仍選擇 1940 年作為此種關係的起點 (Baylis, 1984;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3)。

近的武器與操作機制、技術人員的聯合組訓與交流」(James, 1974: 7289)。儘管所謂「特殊關係」一詞應非Churchill發明的，但這篇演說仍奠定了該名詞的地位。

進言之，對於英美兩國「特殊關係」的討論，除了其歷史淵源外，更重要的應該是支撐此種關係的力量基礎，以及該種關係所表現出來內涵的問題。正如英國學者 Sir Denis Brogan 所言：「英美兩國在語言與文化上的關係，在其他任意兩個大國間都找不到」(Brogan, 1964: 71)。A.C. Turner 也認為：「…英美兩國間的特殊關係既有其自然與地理上的基礎，…相同語言更是此社群的形成出發點」(Turner, 1971: 24)。美國前國務卿 George Ball 指出：「英美兩國在世界觀層次、智識傳統與政治組織，以及文化遺產與法律制度方面都相當接近，…因此得以分享許多原則，並由此形成對彼此的肯定」(Ball, 1968: 91)。不可諱言地，文化層面的近似性當然是英美兩國關係中顯而易見的正面因素，但正如 Dumbrell 指出的，兩國所以形成特殊關係的關鍵還是在於其「共同利益」(Dumbrell, 2001: 7)，至於「防務關係」則是核心所在。

所謂共同利益指的是兩國對歐洲大陸發展的態度而言。正如眾所週知，自十九世紀以來，如何透過「平衡者」角色阻止單一強權控制歐陸，一直是英國的基本國策，儘管此種政策在霸權地位衰落後已很難維持下去，但英國顯然並不打算立即放棄(蔡東杰，2001：84-85)。相對地，在歐洲成爲冷戰時期美蘇兩極對抗之橋頭堡的情況下，如何能夠有效地控制歐洲大陸顯然也是美國圍堵政策思考的重點；對此，美國既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設計與多數西歐重要國家結合成防務共同體框架，但特別是歐洲自 1950 年代以來所推進的整合運動，美國既無法反對，但也不希望此種發展有礙於美國對歐洲的影響力，因此擁有英國這個歐洲的「隱形盟友」，也就成爲一種可接受的操控途徑。

在防務關係方面，英美合作首先凸顯在基地利用問題上。到 1950 年代末左右，部份美國人士還曾自誇擁有美國在英國基地部署飛彈的完全控制

權（Macmillan, 1971: 474）；事實上，這亦反映在核武指揮問題的「雙軌制」（two-key system）指揮原則上²。此外兩國不僅自大戰期間便開始進行「軍隊標準化」的協調工作（Butler, 1957: 341），在戰爭期間建立共同生產與管理單位，在軍事資訊交流方面，如同M. Growing所言：「各方面的軍事資訊，如美國的軍事計劃指令，包含英國貢獻的聯合研究與發展計劃與美國的研究發展計劃，均得讓英國知悉詳情」（Growing, 1974: 117）。Rosecrance更指出：「戰後英美特殊關係所減緩的方向並不是直線下降地」（Rosecrance, 1968: 50）。這也顯示英美特殊關係並非只為了因應大戰而暫時存在。除可見的軍事合作，隱性的情報交流亦相當重要，例如英國的「國家通訊總部」（GCHQ）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便是這方面最主要的合作單位（Bamford, 1983）；特別是兩國在1950年所達成的幾項協定中也要求完全交換彼此的軍事情報資訊；而美國「中情局」（CIA）與英國「特殊情報局」（SIS）亦時常互相競爭情報收集能力（Bell, 1964: 112; Pincher, 1978: 157-63）。總之，這種密切的防務合作關係，既大大拉近兩國距離，從現實發展結果看來，除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外，兩國在外交政策上幾乎展現出高度的一致性³。儘管如此，英國對「英美特殊關係」的重視程度要高於美國乃是個不可否認的現實，這也是我們接下來在觀察日台關係時首先必須注意的變數；其次，英美「特殊關係」既來自前述特殊的歷史背景，更由於它在國際政治中仍屬罕見案例，因此能否衍生使用也值得商榷。

² 在美國總統Eisenhower與英國首相Macmillan於1957年因中程彈道飛彈合作問題所召開的百慕達會議中，首度決定了「雙軌制」的操作系統；其後，在1962年拿騷會議中關於美國提供英國北極星飛彈的問題，亦採取「雙軌制」設計。

³ 例如美國在1982年因支持英國進軍福克蘭群島，結果導致拉丁美洲至今越演越烈的反美浪潮，而英國在2003年輿論普遍反對的情況下，也成為唯一實質支持美國進軍伊拉克的國家，甚至因此讓英國首相Blair被譏稱為“Bush's poodle”。當然也有學者質疑此種關係（Freedman, 2006: 61-73）。

貳、冷戰前期的台日關係互動

無可置疑地，美國可說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迄今影響日本與台灣對外關係以及其彼此互動的最關鍵因素，至於起點則是美國的冷戰佈局概念。正如美國總統Harry Truman所言：「除非我們強烈支持中國，否則蘇聯將在遠東取代日本的地位」（May, 1975: 10）。但因中共最初採取對蘇聯「一邊倒」政策的緣故，再加上韓戰爆發，更迫使其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Dean Rusk正式宣稱「儘管所轄領土很小」，美國仍承認在台灣的國民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權；緊接著在推動各國與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後（Henshall, 1999: 151-52），雖有部份國家持反對態度，美國仍安排台灣與日本在 1952 年締結終戰條約（吉田茂，1965：44-45）；不過，無論是『舊金山和約』或『中日和約』，都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澎列嶼的權利要求，至於未來歸屬則未曾進一步說明，這可說配合美國利益與外交政策預留空間的做法（丘宏達，1989：455）。進一步來說，美國預留外交空間的作為同時反映在 1954 年締結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裡，據此，美國將適用範圍限定於「台灣及澎湖群島」，其理由顯然是希望迴避受到台灣「反攻」政策波及，因此在軍援方面亦僅限於提供防衛性武器⁴。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是影響日台關係最主要的變數來源，但後兩者特殊互動關係的「雛型」卻早在冷戰初期便發展開來。例如若干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的成員自 1950 年起便成為重新訓練國府軍官的力量，其後一直持續到 1964—69 年間才大致結束，從某個角度來看，或許「蔣真正信賴的為日本的軍事顧問團，而不是美軍顧問團」，至於以白團為首的舊軍人勢力與保守派力量也很快地在 1957 年岸信介政府期間形成日本「台灣遊

⁴ 美國國會雖在 1955 年 1 月通過『台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授權總統必要時可以武力協防台灣，但美國仍自 8 月起和中國舉行大使級對談，顯示其既不願動武，也不放棄與中共政權建交的最終目標。

說團」的主要勢力內容（戴國輝，1989：154-57）。同年，岸信介不僅成爲戰後首位訪問台灣的日本首相⁵，更於1960年推動在新『美日安保條約』中加入『遠東條款』。其後，1964年執政的佐藤榮作（岸信介胞弟）也強調「台灣是日本安全一個極重要因素」，一方面強調「台灣地位未定論」，同時也堅持反中立場。無論如何，在Nixon總統於1972年訪問中國並簽署『上海公報』後，也讓台灣問題重新浮上檯面。美國在該份公報中表示「認知」（acknowledge）到「台灣海峽雙方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爲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感到美國進行對華秘密外交（此舉並未先行知會日本）的威脅⁶，從而也形成「不希望在建交議題上落後美國」的急迫感（林代昭，1992：192-93），其結果既促使佐藤在1972年6月下台，也導致同年日本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與台灣斷交。

事實上，早在池田勇人於1960年接任首相時，便曾聲稱日本「在對中共的政策方面未必要採取與美國相同的態度」（田桓，1996：495），並以促進雙邊貿易爲目標，自1964年起互設聯絡處⁷。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也可說是後來日台特殊關係發展在「形式」方面的一種先驅型態。因爲自1972年日本與台灣方面斷交後，兩國間便改採維持實質關係的原則，分別由「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作爲具準官方性質的新管道⁸；在兩會簽署「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後，亞東關係協會接著在東京、大阪、福岡、橫濱等四個地點，而交流協會亦在台北與高雄兩地設立辦事處。更

⁵ 除岸信介外，冷戰時期日本現任首相訪台的就只有作藤榮作（1967），至於卸任首相訪台者則有吉田茂（1964，以池田首相特使身分）。

⁶ 日本方面多將美國此舉視爲「越頂外交」，或直稱爲「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

⁷ 中國於1964年8月13日設置「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直屬中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業務由外貿部第四局承辦），次年1月28日，日本也設置「高崎辦事處駐北京聯絡事務所」，表面上設於自民黨議員高碕達之助所經營「東洋鋼板公司」內，但高碕事實上是通產省代表（羅平漢，2000：131-35）。

⁸ 在1991年日本外務省發表的「外交青書」（亦即外交政策白皮書，頁33）首度公開指出台灣經濟成長對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後，次年5月，台灣駐日各代表處也開始分別易名爲「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

甚者，此種具有「民間交流、官方掛鉤」準官方特色的「日本模式」，也成為美國在 1979 年與台灣方面斷交後，捨棄「德國模式」（亦即雙重承認）而選擇與台灣互動的新準則；美國除了在建交聲明中再度強調『上海公報』中對於「一個中國」的立場外，也表明「在此範圍內，美國政府與台灣居民保持文化、商務及其他非政府關係」的立場。

參、日本模式下的日台特殊關係發展

自 1972 年改以所謂「日本模式」展開新關係後，日台間互動大體可分成三個階段來觀察，亦即 1970-80 年代的「低調發展期」，1990 年代的「加溫期」與 2000 年以來的「特殊關係建構期」。首先在「低調發展期」中，日本先是由自民黨內部份右翼議員組成諸如「青嵐會」及「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等親台政治團體⁹；此類組織雖表面上僅是由國會議員組成的次級團體，但因份子包括許多實力派人士，因此影響力亦不容小覷；在 1980 年代初亦曾連絡諸如「青年思想研究會」與「日本青年社」等右翼社團公開支持台灣，其後在 1986 年又支持推動增加亞東關係協會駐東京辦事處成員，並新增經濟、科技與政務小組，大大提升日台互動能力；同年，日本既在「光華寮爭議」中採取有利台灣的立場，同時給予亞東關係協會機構人員準外交官待遇，顯示日台關係已逐漸朝加溫方向邁進。

⁹ 青嵐會於 1972 年組成，發起人代表為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為幹事長，中尾榮一為執行主席，濱田幸一為事務局長，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則成立於 1973 年，歷任會長包括灘尾弘吉、藤尾正行與山中貞則等。在 1993 年小澤一郎脫離自民黨另創新進黨後，該黨以小澤辰男為首也另行組成「日華議員聯盟」，但 1997 年又合流回「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目前成員約 300 人，乃日本國會中最大的跨黨派親台組織（本澤二郎，1998：146）。目前懇談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舊成員多為否定侵略歷史的右翼鷹派，（2）少壯新生代成員有上升趨勢，更重視台灣對日本的現實戰略地位，（3）其中多數成員在兩岸關係中採取「腳踏兩條船」態度，同時加入「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盧曉衡編，2003：110-11）。

事實上，由於日本自 1970 年代起便成為參加 G-7 會議的唯一亞洲國家，1982 年出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更形成朝「政治大國」邁進的外交政策。在此期間，一方面「雁行理論」在東亞風行一時，而日本也開始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再加上蘇聯崩解導致冷戰時期宣告終結，海部俊樹首相乃順勢在 1990 年提出「必須由美、日、歐三極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的主張，強調應促使日本「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與自己強大經濟實力相適應的角色」（日本外務省，1991）；小澤一郎更倡言日本必須力圖改變「經濟一流、政治三流」的「小腦袋恐龍」形象，並擺脫戰後「重經濟、輕軍事」的單純「商人國家」路線，以便朝向「普通國家」或「正常國家」邁進（小澤一郎，1993：102-5）。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方面可說是後來日本正常化政策的先聲，同時，就當時日本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聯合國會費第二大貢獻國的角色看來，理論上也屬於某種正常的心理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國威脅論」在 1990 年代初浮上檯面，再加上日本的泡沫經濟於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崩潰，連續十餘年經濟低迷的困境不僅讓它必須面對「政治大國」夢碎的挑戰，甚至連東亞經濟龍頭優勢亦飽受來自中國的威脅；在民族主義與權力危機感的促使下（Calder, 2006: 130），隨著中日對立態勢出現，台日關係也開始向上發展，從而進入「加溫期」當中。當然，自 1970 年代以來，日本與台灣間不僅透過準官方形式維持互動，特別在經濟方面更具有極其密切的聯繫；例如台灣雖長久以來與各國貿易大都是出超，唯獨對日本卻呈現入超狀態，非但自 1992 年後動輒出現 100 億美元以上的赤字，2004 年後甚至超過 300 億美元以上。

總的來說，在政治與經濟面的雙重影響下，1990 年代日台關係的正面具體表現包括：1990 年 7 月，立法院副院長劉松藩訪問日本，創下台日斷交以來訪日層級最高紀錄，也正式象徵雙邊關係開始明顯加溫；1993 年，細川護熙內閣的小澤一郎成為首次稱呼台灣為「國家」的日本內閣成員，同年 2 月，並且也是在自民黨主導「五五體制」的最後半年期間¹⁰，台灣外

¹⁰ 在自由黨與民主黨在 1955 年合組自由民主黨後，日本自此進入一黨獨大時期，被稱為

交部長錢復得以非正式地訪問日本；1994年9月，在「李登輝訪日風波」下，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藉由出席廣島亞運開幕式名義率團訪問日本，一度讓中日關係降至冰點；1996年在發表的『美日安保共同宣言』中，對於「周邊有事」的模糊處理原則被認為涵括台灣在內；1997年，日本進一步宣佈同意已停航23年的「大阪—台北」航線得以重新復航。不過，由於台日雙邊關係迄今仍以檯面下的「幕後」運作為主，在此種特殊情況限制之下，台日關係接近究竟能讓台灣方面得到何種收穫？日本的親台派真的有助於台灣的國家利益？他們的出發點為何？而中國方面又如何回應？這些或許都是必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從某個角度來看，日本的親台派議員（台灣幫）大都認為「台灣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因此「台海危機」議題與「中國威脅論」往往也就成為台灣拉近與美日安保體制距離的橋樑，從而也使台灣在兩岸關係的不對稱結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支柱。為達成拉攏日本的目的，加強雙邊經貿交流對僅擁有經濟資源的台灣來說也是很自然的動作，這一方面既是台灣長期對於對日貿易逆差默不吭聲的原因，至於在一般貿易往來外，台灣也企圖透過政策性行為來拉攏日本，其中在1990年代最典型的政策案例可算是國民黨的沖繩投資案，以及台灣高鐵的外國合作對象案。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日台關係在1990年代有加溫傾向，但日本政界對此議題的看法其實也分成兩派，例如在1996—97年間，親中派的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紘一主張所謂「周邊有事」應予清楚界定且「不包括台灣」，但右翼的官房長官梶山靜六與防衛廳長官秋山昌廣則認為，地理界定愈模糊對日本愈有利¹¹。再者，儘管在日本國會中存在著好幾個親台團體，例如「日台友好議員聯盟」、「21世紀委員會」、「日台友好懇談會」以及執台灣幫牛耳的「日華議員懇談會」

「五五體制」；1993年，由於小澤一郎、羽田孜與武村正義等脫離建立新生黨與新黨，導致自民黨在同年大選中失去第一大黨與組閣地位，從而亦終結了該體制（岡澤憲芙，1998；梁雲祥與應霄燕，2000：29）。

¹¹ 日本國會後來在1999年5月通過的「有事三法」由於未具體確立地理範圍，等於含混地將台灣納入美日安保的保護圈內。

（1997年2月改組成跨黨派性質團體）等¹²，不過，很多人其實同時扮演「親台派」和「親中派」兩個雙重角色，以便必要時可立即轉換立場（本澤二郎，1998：174-75），這不啻也暗示了日台關係的不穩定本質。

肆、台灣政黨輪替後的日台關係發展

從某個角度來看，1998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日期間，發表要求日本反省戰爭作為的言論並激起日本輿論反彈，可說是中日台三邊關係的轉捩點，至於2001年李登輝的訪日事件則象徵著台日關係新階段的開始（衛藤征士郎與小枝義人，2002：108-18）。

首先，在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導致出現首次「政黨輪替」之後，一方面日本方面相當在意「李登輝路線」能否延續的問題，相對地，為抗拒來自中國的威脅，由於美國和日本一直是台灣長期仰賴的兩大國際力量來源，台灣自2001年起也擺出重視日本的姿態，首先是在總統府內設置「對日工作專案小組」，企圖建立一個跨部門整合聯繫管道¹³。2002年內閣改組後，新任外長簡又新接著在部內成立「有關日本問題諮詢委員會」，並設置一個「對日工作小組」，配合總統府重視日本的政策，同時指出未來對日工作的五項重點：推動高層互訪（特別是與新世代政治人物的交流）；強化與日本政治人物的接觸，提升政府間交流；提升台海安全問題的重要性；檢討並促進台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爭取日本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至於在政黨與民間交流方面，首先是民進黨於2001年8月組織了跟日本國會議員交流窗口的「台日友好協會」，於此同時，屬超黨派性質的「立法院台日

¹² 以2002年為例，其重要成員包括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幹事）、副官房長官安倍晉三、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副會長）、外務副大臣茂木敏充、政務調查會長麻生太郎、國會對策委員長中川秀直、前述眾議院議長綿貫民輔、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副會長）等。

¹³ 小組運作由總統府秘書長負責，日方對口單位為內閣官房長官；小組屬協調會報性質，統工作範疇包括政府、國會、企業界、學界、科技界、文化界等，並未包括軍事部門，每個月固定召開一次會議（<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sep/28/r-twjapan3.htm>）（2007/6/25）。

交流聯誼會」重新改組，立法院副院長江丙坤並於 2002 年初率團訪日。最後，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則於 2001 年組織了「台日交流聯誼會」。

相對地，日本在新世紀初也開始修正其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以「經濟外交」爲主流的政策走向，特別是隨著中國軍事實力日益增強以及「中國威脅論」意識擴散的結果，以自身安全保障爲著眼點的「安保外交」因此有取代「經濟外交」的趨勢。儘管日本政府在 1972 年的『日中共同聲明』中對所謂「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份」的立場表示「理解與尊重」（添谷芳秀，1995），表面上似乎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希望兩岸問題和平解決，但基於地緣因素考量，實際上比任何國家更戒懼中國統一的可能性，由此也使其與具本土意識的台灣新政府成爲某種程度的「天然盟友」。再加上日本自 2000 年 1 月爆發一連串不當使用機密費事件後，外務系統連連出狀況，於是「中國政策」乃至與其相關的人事制度也順勢成爲被整頓的重點¹⁴，許多出身親中派的外務省官員紛紛被大量外放出去。

除整頓向來被認爲受「親中派」把持的外務省系統外，日本高層的若干政治行爲也表現出不尋常的對台友善氣氛，例如日本民主黨幹事長菅直人於 2002 年在上海一場研討會上「中國應讓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說法，可說顛覆了 1972 年以來台日中關係架構，並顯示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蛻變；同年 10 月，在東京舉行的台灣「雙十節」宴會中，眾議院議長綿貫民輔和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亦親自到場致辭，這是首次有現任閣員出席類似場合發表祝詞；同年底，日本又決定派遣退役將領長野陽一至交流協會任職，負責等同於大使館內「駐外武官」的重要工作，這也是台日斷交後首位駐台的日本軍方人士¹⁵。再者，日本首相的外交諮詢機構「對外關係特別工作

¹⁴ 在日本外務省裡面，特定語言研修者獨占某項職位，經常形成派系弊端，尤其以「中國語研修者」的「中國學派」（China School）爲最，其佼佼者多半沿著「中國學派—中國課長—亞洲局長—駐中國大使」路徑逐步攀升上來。

¹⁵ 長野陽一出身防衛大學，歷任統合幕僚會議調整官、情報本部計畫部長等職，2002 年 12 月退役前擔任北海道千歲市第一特科團長，官拜陸將補（相當於少將）。1986 年起，他曾在北京日本大使館擔任參事官和防衛駐在武官三年，深諳中國事務。

小組」隨後在 2002 年底提出一份「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報告書，其中強調，日本的外交缺乏中長期的策略，應速創設「外交安全保障會議」的機構「以構築中長期外交政策」，並建議政府「應捨棄長期以來由外務省主導的外交政策，調整對外政策的優先順位」。至於在有關台日關係的項目上，報告書指出「台日實務關係必須進一步強化」；儘管自日本與中國建交以來，台日關係並未脫離「日中共同聲明」範疇，但因台灣首先放棄了反攻政策，其次逐步推進民主化運動，最後是成功加入 APEC 與 WTO，甚至與中國關係也有顯著進展，因此台日關係出現變革也是極為自然的。

在實質進展方面，由於瞭解政治突破在短期間不可能，因此台灣也將焦點鎖定在經濟部分，特別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例如在 2001 年上海 APEC 會議期間，經濟部長林信義便跟日本產經大臣平沼赳夫進行溝通，但由於台灣方面過早將消息曝光，引發中國與日本外務省不滿，最後無疾而終。事實上，儘管日本存在一批右翼保守親台派，但在其總體認知當中，台灣對日本的價值僅在於「反中」議題上，特別是關於海洋與漁權問題，日本對台灣的不假辭色幾乎看不到親台色彩；再者，台灣在日本政界雖培養出部分親台人士，但整體來看，他們既無力扭轉大局，甚至有人僅爲了「私欲」（藉由台灣援助來籌措選舉資金）才加入台灣幫陣營當中，這些都顯示出台日關係間的脆弱性。

當然，具體進展也不是沒有，例如在小泉於 2003 年連任自民黨總裁後，日本新內閣中大半是「對台友好」官員，這也導致近年來日本政府對台灣態度的明顯改善，例如日本外務省已取消過去不允許課長級以上官員訪台的規定，日本和台灣半官方機關在 2004 年簽定『SARS 等共同研究相關的備忘錄』，這是日台間首次締結的正式公共醫療協定；再者，日本國會更在 2005 年中通過台灣觀光客免簽證特例法案，這亦可說是一大進展。正如李登輝在 2005 年初結束二度訪日行程後所表示的，台灣和日本的外交關係是「無聲」地進行；儘管偶爾也有例外，例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便在 2006 年 3 月表示「日本和台灣應保持國家關係」。於此同時，日本外務省在公佈

的《2006年外交藍皮書》中亦透露出對中國軍力的增強感到憂慮，並強調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日本有必要多注視日台關係。這些或許都強烈暗示著日本有拉攏與台灣關係的思考與政策必然性，但事實真否如此，則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檢證的問題。

伍、日台特殊關係的未來可能發展

大體來說，一方面由於台灣政府加強對日關係聯繫，另一方面也因為中日摩擦提升，於是表面上日台關係既持續著 1980 年代以來的加溫趨勢，甚至有出現新互動框架的可能性。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指出，目前日台關係發展仍存在兩個特色：首先，與其說日台間正在建構所謂「特殊關係」，還不如說其正先朝著「正常化」方向進展當中。舉例來說，相較於其他與台灣維持準官方聯繫的國家，日本雖看來與台灣互動密切，但對台對口單位甚至沒有任何政治性的標示，只使用極中立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對兩國間交往的層級限制也非常嚴格，如果單從這個角度看來，或許有人還會認為台日關係惡劣。

其次，2000 年以來的台日關係升溫，主要呈現「官方（行政機關）冷，民間（民意機構、私人智庫與退休官員）與基層（在野黨與年輕議員）熱」的態勢；例如在台灣安保協會於 2005 年舉辦的研討會中，與會的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金田秀昭便曾主張，未來日本和美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時，應將台灣納為觀察員，以共同阻止中國取得西太平洋的「海洋霸權」。又如「東京財團」智庫也在 2004 年初發表一項促請提高交流層次的「加強日台關係的六項建議」，指出台日關係是「在 FTA 締結上最不會出現障礙的關係」，在安全保障方面應設立「日台安全保障論壇」，定期舉行情報的交換與共同訓練。同年，由多位民主黨兩院議員組成的「日本·台灣安保經濟研究會」也通過支持台灣正名與加入國際組織等決議。至於日本平成國際大學教授淺野和生則在 2005 年底發表個人研擬的『日台關係

基本法』草案，強調日本擬訂類似美國『台灣關係法』的必要性，並期待能在小泉首相任內實現，以加強兩國間的友好交流關係。

事實上，如果從英美特殊關係發展來做比較觀察的話，台灣與日本間確實存在著可能發展出特殊關係的基礎，例如由於過去殖民歷史經驗與當前大眾流行趨勢發展，這使雙方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文化共通處，至於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威脅感也逐漸形塑出某種共同利益來。只不過，儘管台灣方面希望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朝特殊關係方向發展，而日本方面確也做出若干政策回應（岡田充，2003：216-22），但程度畢竟相當有限。推究日本方面所以在深化台日關係上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可能有二：首先是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畢竟難以迅速擺脫過去「政治小國」的保守心態，因此在對抗崛起的中國時，也不易凝聚對抗決心；其次，則或許來自於對未來國際局勢發展的預測，特別是針對 2008 關鍵年（中國舉辦奧運會，台灣與美國則將先後舉辦總統選舉），如果中國成功提升威望，台灣與美國分別由泛藍集團與共和黨贏得勝選，那麼日本的選擇對抗政策將徒使自己陷入孤立窘境。

儘管如此，尤其從日本角度來看，如果說未來可能出現有利於推動台日特殊關係發展之變數的話，或許是其國內政治結構變遷的結果。一方面日本在 2001 年政府改造行動中，大幅削弱了傳統菁英職業官僚的發言權，各部會政務官由 2 位（大臣及政務次官）增加至 6 位（大臣、2 位副大臣與 3 位政務次官）。同時由於選舉制度改革，日本政界也出現世代交替現象。目前支配日本政壇的政治人物，大致可分為三個世代¹⁶；這三個世代的共同點是多出生於戰後，歷經 1960—80 年代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長期浸淫在民主政治的洗禮中，因此對民主價值具有高度共鳴，也對日本的力量比較有自信。他們認為日本外交的基礎是日本的「國益」，傾向在共同戰略利益下，以理性方式處理日本對外關係。於此同時，這些世代面對台灣時既不

¹⁶ 三個世代分別是：(1) 以小泉首相為例的「安保世代」；(2) 比小泉年輕 10 歲左右的「團塊世代」；(3) 以民主黨政治菁英為例的「後團塊世代」。前兩個世代會是未來 10-15 年日本政壇的主流，至於第三個世代年紀在 35-45 歲間，橫跨包括政黨、政府、學術界及輿論界等領域，也是最獨立於政黨，企圖心也最強的世代政治力量。

存在過去殖民時代衍生的複雜情感，也對台灣本身發展充滿興趣，並強調台日間共同的戰略利益。進言之，這股力量可說是日本各界近年來明顯改變對台態度的主要動力，他們多半既對台灣抱持著好感與密切聯繫¹⁷，也傾向支持深化雙邊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倍晉三於 2006 年當選新首相後，日本政策走向是否發生變化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作為岸信介的孫子，安倍的親台傾向可說有跡可循，但從他上任後隨即展開訪問中國行程看來，預料未來台日關係仍將繼續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儘管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池田維曾表示，安倍上台後隨即訪問中國是希望能改善雙邊關係，而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基本立場應不會因政權更替而受影響，更何況中國近來快速的擴充軍備，也讓日本深刻憂慮；但因安倍上台後民意支持度始終低迷不振，雖在 2007 年 4 月後有止跌回升跡象，但是否因此影響日本的外交政策，則是我們必須繼續觀察的。

¹⁷ 例如 2004 年 8 月，便有一群由 35 歲以下的自民黨年輕政治家所組成的「自民黨青年部、青年局幹部研修團」訪問台灣政界，尤其是執政黨。2006 年 4 月，由自民黨 10 多名兩院年輕議員亦發起「日本與台灣經濟文化交流年輕國會議員促進會」，簡稱「日台年輕國會議員聯盟」，並選出岸信夫參議員（前首相岸信介之孫與現任官房長官安倍晉三之弟）為首任會長。

參考資料

- Allen, H. C. 1954.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783-1952*. London: Odhams Press.
- Ball, G. 1968. *The Discipline of Power*. London: Bodley Head.
- Bamford, J. 1983. *The Puzzle Palace*. London: Penguin.
- Baylis, J. 1984. *Anglo-American Defense Relations 1939-1984: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London: Macmillan Ltd.
- Bell, C. 1964. *The Debatable Alliance: An Essay i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gan, D. 1964. *American Aspects*. New York: Harper & Row.
- Butler, J. R. M. 1957. *Grand Strategy, Vol. I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 Calder, Kent. 2006.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p. 130.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3.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Dumbrell, J. 2001.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and After*. New York: St. Martin's.
- Freedman, Lawrence D. 2006.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n and Now."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3, pp. 61-73.
- Growing, M. 1974. *Independence and Deterrence,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45-1952, Vol. I*. London: MacMillan.
- Henshall, Kenneth G. 1999. *A History of Japan: 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James, R.R. 1974. *Winston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 Vol. VII*. Londo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 Macmillan, H. 1971. *Riding the Storm, 1956-1959*. London: Macmillan.
- May, Ernest R. 1975.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Nicholas, H. G. 1975.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Press.
- Pincher, C. 1978. *Inside Story: A Documentary of the Pursuit of Power*. London: Book Club Associates.
- Rosecrance, Robert N. 1968. *Defense of the Realm: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Epo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A. C. 1971. *The Unique Partnership: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 New York: Pegasus.
- Zorgbibe, Charles (胡祖慶譯)。1995。《國際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小澤一郎。1993。《日本改造計畫》。東京：講談社。
- 日本外務省。1991。《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 丘宏達編。1989。《現代國際法基本文件》。台北：三民書局。
- 本澤二郎。1998。《台湾ロビー》。東京：株式会社データハウス。
- 田桓主編。1996。《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7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吉田茂。1965。《十年回憶：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岡田充。2003。《中國と台灣》。東京：講談社。
- 岡澤憲芙。1998。《政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 林代昭。1992。《戰後中日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梁雲祥、應霄燕。2000。《後冷戰時代的日本政治、經濟與外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添谷芳秀。1995。《日本外交と中國 1945-1972》。東京：慶應通信。
- 蔡東杰。2001。《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 衛藤征士郎、小枝義人。2002。《檢證・李登輝訪日：日本外交轉換點》。東京：BNP 株式会社。
- 盧曉衡(編)。2003。《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戴國輝。1989。《台灣總體相：住民・歷史・心性》。台北：遠流出版社。
- 羅平漢。2000。《中國對日政策與中日邦交正常化》。北京：時事出版社。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ung-Chieh Tasi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Though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Japan and Taiwan since the Cold War era, because of their geopolitical positi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olonialism,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elites and economic regimes, however, Japan is now obviously one of the crucial quasi-alliance to Taiwan. In this paper, I will analyze the so-called “special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U.K.-U.S. interaction firstly, then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and try to observe the possible framework between the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ost-Cold War era, Japan, Taiwan, special relationship